



大南洋论 印度丛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系列改革成果之一，申报馆推出了以介绍日、苏、美、德等国现状为主，兼及本国国情和文化艺术的《申报丛书》和《申报月刊社丛书》，意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使国人更好地了解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以激发保国强种、救亡图存之决心。该丛书陆续出版专著、译著五十余种，今从中精选四十六种，总以《申报丛书》之名推出，以飨读者。



申報叢書

拾肆

大南洋论
印度丛谈

上海图书馆 整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申报丛书 . 14 / 上海图书馆整理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39-5511-0

I . ①申 … II . ①上 … III . ①世界史—现代史—史料 IV . ①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3558 号

责任编辑：倪文君 于玲玲 张靖伟

封面设计：孙 艺

申报丛书 拾肆

上海图书馆 整理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650×900 1/16 印张 29 字数 256 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5511-0

定价：98.00 元

<http://www.sstlp.com>

前　　言

黄显功

《申报》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不仅开创了一系列中国新闻史的先例，而且在报业经营管理方面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皆把中国近代报纸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开展图书出版就是在主营报纸之外的又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是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重要先驱。

在《申报》近 78 年的历史中，随着发行量的不断扩大，报纸之外的图书、期刊、画报、地图、年鉴等多种类型的出版物陆续推出，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新闻出版体系。就其图书出版而言，大致分三个阶段展现了申报馆图书出版的概貌。

申报馆的早期图书出版是在《申报》创办人安纳斯脱·美查的主持下开展起来的。作为商人的美查，精于经营，唯利是图。在《申报》经营过程中所派生的各种出版物虽然是商业运作的必然产物，但其效果却是促进了晚清上海新闻业的多元

化经营,推动了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报业产业化经营的历史雏形,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美查在申报馆之外,先后创办了申昌书局(原名申昌书画室)、点石斋书局(原名点石斋书画室)、图书集成印书局等机构,专司图书的印刷、出版和销售,组建了较为完整的编辑、印刷、发行体系。自同治十一年十月(1872年11月)首次推出《瀛寰琐纪》文艺性作品集后,美查的申报馆附属出版物开始起步;次年五月出版了申报主笔蒋芷湘所编的《文苑菁华》,这是专为科举考生而编印的图书。直到同治十三年九月(1874年10月)美查以铅活字排印了1000部《儒林外史》,并连续重印获利显著之后,图书出版逐渐成为申报馆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版经营日趋成熟,图书品种日益增多,在晚清西方教会主导的新式出版活动中异军突起,成为民营出版机构的主要代表。从光绪三年(1877)编印的《申报馆书目》和光绪五年(1879)编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所列书目来看,申报馆的图书出版已有相当规模,正如《申报馆书目》序言作者蔡尔康所言:“申江以聚珍板印书问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报馆独为其创,六载以来,日有搜辑,月有投赠。”不仅技术领先,而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关注度。美查在附录中也说:“近日本馆印行之书每月不下三四部。”由此可见,其出版规模颇为可观。^①在此基

^① 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2005年4月版,第177页,179页。

础上,美查经过多年策划,在光绪十三年(1887)重印了煌煌巨著——中国古代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因此,“《申报》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已发展成为上海较完备的新闻出版中心”^①,树立了中国报业图书出版的成功典范。

美查时期的图书出版具有显著的特点,即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十分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所出图书内容大部分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弥补19世纪中期因战乱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传承中华文化确有实效。其所印古籍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之需,而且以近代出版的新模式和新技术使古典名著成为市场上的常销书。

1912年史量才主持申报馆后,励精图治,积极改革创新,大力调整报馆的经营管理,使其在短期内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1922年正值《申报》创刊50周年,也是史量才接办该报的第十年,为此,由黄炎培主编、约请名家撰稿、历时一年完成的《最近之五十季》大型纪念册正式推出。这本申报馆出版史上最著名的图书共分三编,即“五十年来之世界”、“五十年来之中国”、“五十年来之新闻事业”,以上百万字的篇幅总结了《申报》的历史,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和世界五十年来各方面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①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一八五〇—一九四九)》,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71页。

十年之后的 1932 年是申报馆出版史上的重要时刻。著名的《申报月刊》在 1932 年 7 月正式创刊，成为与中华书局《新中华》、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齐名的上海三大杂志之一。申报馆还以《申报月刊》的名义，从 1932 年 11 月起推出《申报月刊社丛书》，至 1935 年共出版了 12 种。1932 年正是《申报》创刊 60 周年，史量才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中宣布了 12 项革新计划，把图书的编辑出版也列入其中。如第 11 项是出版《申报年鉴》，称“年鉴综集一年来我国内政治经济以至社会的主要事实，加以系统的叙述，附以各种重要的统计。每年出一巨册，即不啻为我国国情逐年的信使”。1933 年首卷《申报年鉴》的出版，实现了史量才“俾日报月刊为经，年鉴为纬”的报业综合出版的经营构想。^① 至 1937 年，《申报年鉴》共出版了四卷，是我国早期影响最大的年鉴之一。

从 1933 年 5 月开始，申报馆陆续出版发行了由上海文库主编的《申报丛书》，共计 40 余种。1934 年 4 月 20 日正式出版了由地质学家丁文江倡议，翁文灏、曾世英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这部大型精装地图集是我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空前巨作。该书在问世前曾于 1933 年 8 月出版简编本《中国分省新图》，此后不断重版，流传颇广，影响很大。这两部地图集在十余年间是人们主要的地图工具书。

^① 见史量才：《申报六十年发行年鉴之旨趣》，载《申报年鉴》，1933 年版。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是申报馆图书出版的重要阶段。史量才是关注社会文化建设的有志之士,在办报之外,热心于公益文化事业。1932年,他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1933年1月和3月,又分别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新闻函授学校。配合“三校一馆”,申报馆也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如申报流通图书馆于1934年设立读书指导部,并在《申报》上开辟《读书指导》、《读书问答》等专栏,回答读者所关心的时事、哲学、社会科学和生活问题,由艾思奇、夏征农、柳湜等负责撰文回答,这些文章以《读者问答集》为名陆续出版。此外还出版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丛书》16种。

总之,史量才主持《申报》的22年间是申报馆出版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不仅在报纸主业上推陈出新,开设了一系列专刊、特刊,在衍生的期刊杂志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在图书出版方面以新面貌、新内容推出了一批适应时代发展特点的读物,如《最近之五十季》、《申报月刊社丛书》、《申报丛书》皆关注现实社会,特别是中国现状、国际形势和世界知识,对苏联和日本两个邻国特别重视。其所出图书充分反映了报业出版的“新闻”烙印,是办报人重视当下社会状况的职业性延伸,成为报纸新闻与专题报道的重要补充和综合,构建了新闻出版的综合体系,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申报馆图书出版的第三阶段是抗战至《申报》停办。这一阶段的《申报》正处于曲折的动荡期,多次经历停刊、迁移、复

刊、接管等变故，遭遇汪伪特工破坏、日军控制，直至国民党接管改组，在经营环境不稳定与恶化的形势下，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数量十分有限，较有影响者是 1943 年至 1944 年出版的三集《申报社评选》、1946 年出版的《申报上海市民手册》等。

报纸、期刊与图书虽然是不同类型的出版物，但申报馆将其融为一体，互为补充，组合成为以报纸为龙头的综合性出版体系，既在媒体的出版物形式上丰富了《申报》，也在报业经营方面壮大了作为企业的申报馆。特别是美查与史量才两个时期的图书出版，为我们研究《申报》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从其图书内容的特点来看，前者具有中国性、传统性，后者则具有国际性、社会性。这种从关注过去转为重视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改变，不仅体现了时代的文化特征，而且反映了媒体的舆论导向与政治态度。如今，我国已有十余家报业出版社，回顾申报馆的出版史对我们如何展示报业出版的个性不无启发意义。

作为《申报》所在地的最大藏书机构，上海图书馆几乎收藏了申报馆的所有出版物。利用这一馆藏优势，本馆历史文献中心的研究人员对《申报丛书》和《申报月刊社丛书》进行了整理，从中精选出 46 种，总以《申报丛书》之名推出。时隔半个多世纪重新整理出版这套图书，能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认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状和时人的观察，也以此纪念《申报》创刊 140 周年。

出版说明

20世纪30年代初期，深陷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动荡不安，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则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对邻国不断滋扰挑衅，并先后在我国东北和上海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正是在此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民族危难迫在眉睫之际，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报馆，申报馆适时推出了两套主题鲜明的丛书：《申报丛书》和《申报月刊社丛书》。

《申报丛书》由《上海文库》主编，申报馆发行，从1933年6月开始陆续编印，总数达40余种；《申报月刊社丛书》由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1932—1935年出版，共出12种。这两套丛书所收录者，多为介绍中国和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历史及现状的专著和译著，尤其侧重于对日本和苏联的政治、军事及经济情况的阐述和分析，甚至还有不少新近的调查报告，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意义。时隔80年后将这两套丛书重新整理出版，除了作为《申报》创刊140周年的纪念外，亦希冀通过这批展现特殊历史时期国人对于世界认知和思考的历史文献，使读者更

好地了解过去、把握将来。

由于这两套丛书出版时间交叉，内容可互为补充，故此次重新整理，特从全部 53 种著述中精选 46 种，将其重新整合编排，并按主题分类，共分 18 册出版，各分册目录可见本书封底。

在此次整理《申报丛书》的过程中，针对民国文献的特殊性，编者确立了相应的整理原则，兹说明如下：

本次整理所据底本皆选自上海图书馆馆藏《申报丛书》和《申报月刊社丛书》，其中绝大部分为初版。

原书为繁体竖排的民国图书，不少字词的使用或不符合现代汉语使用规范，或与当下的习惯用法有别。除了有大量的异体字外，诸如“的”、“地”、“得”，“像”、“象”，“他”、“她”、“它”，“至于”、“致于”以及“形”、“型”等词，也经常混用，而并未像现在这样有严格的区分。虽然此次是以简体横排形式重新排印，但为保存历史文献原貌计，在整理过程中，对原书中的异体字尽量予以保留，仅将特别生僻，或会产生歧义、影响阅读的异体字改为通用的现代汉语。

除异体字外，原书文字尚有不少误植之处，脱字、衍字也偶有所见，编者在整理过程中对此类讹误采取了直接修正的方式。^①对于明显有误但不能径改者，或疑有讹误之处，则以脚注形式予

^① 脱字分两种情况处理：若属于明确的脱漏，则直接补入；若疑有脱字，则用括号形式补入该字。

以指出。原书中有些文句读来颇令人费解,但编者受学识所限,不敢轻言有误,故仍保留原文,请读者阅读时自行判明。

原书中漶漫残缺或者未能辨识的文字代之以方框,数字则代之以问号。

原书标点符号的使用较为混乱,现按现行标点符号使用规范进行统一改正。

原书中的数字和日期绝大部分为汉字,为便阅读,现据实际情况将其改为阿拉伯数字或予以保留:数字出现频率较高时,将其改为阿拉伯数字;以文字为主,偶有数字出现时则仍保留汉字。

原书中的计量单位,与现在通用的计量单位差别较大,且使用较为混乱,往往同一单位有多种译名。现根据出版规范,将已废弃使用的旧译单位,如浬、呎、哩、吋、吋、耗、粳、秆、粧等,改为通用的计量单位,即海里、英里、英尺、英寸、盎司、毫米、厘米、千米、千克等;而对于音译的单位名称,如基罗米突、基罗姆兰姆、生等,则均予以保留。

原书中不少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的译法与当下通行的译名有所不同,如将“斯大林”译为“史太林”、“史大林”,将“希特勒”译为“希脱落”等等;且同一人物、地点,在同一部书中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译名。作为历史文献,这些译名及其使用方式无疑都具有史料价值,因此一律不作改动,只对极个别会引起混淆的译名进行修正,如原书中将鞑靼共和国首都译为“喀什”,因与我国新

疆城市喀什同名，因此统改为现今通用的译名“喀山”。

原书目录与正文标题多有出入，若无正误之分，原则上两者均不作改动，只在其中一处明显有误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修正。

原书所使用的层级序号，不统一亦不符合当前的出版规范，现原则上仍都予以保留；仅在相邻的两个上下层级使用了同一种序号，并可能影响阅读时，才对其进行调整，如对下层层级序号加括号以示区别等。

原书中经常出现的指向性方位词“左”、“右”，在横排图书中当为“下”、“上”之意，如“左表”、“右文”即表示“下表”、“上文”等。

原书中有不少以×代替文字处，是为当时的政治避讳，现均予以保留。

原书中有大量表格，其形式不一，亦多不符合当前出版规范；表格中的数据也有不少值得存疑之处。此次整理，仅按原书对表格进行重新排列，对表中数据不作校订，明显有误之处则出注说明。

原书所有注释（除表下注外），包括脚注、正文夹注、文后注等，一律以脚注形式重排。此次整理过程中编者所加注释，均在注文后标明“编注”字样，未标明任何文字，或标以“译者注”、“编者注”、“编者按”等的，均为原书注释。

作为一套出版于近八十年前的近代文献，原书作者针对某些事件所作的表述和所阐发的观点，无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难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如今看来或不合宜。鉴于此类文字所在多有，不便一一注出，故在此作统一说明。

原丛书中有不少作品是翻译或编译自日文文献，在此过程中，译者有时会直接使用日文中的汉字词或采用一些日方惯用的词汇，如在对日本侵华历史事件的指称中，将“九·一八事变”称为“满洲事变”，将“一·二八事变”称为“上海事变”等等。此外，由于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故原书中关于东北行政区域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多带有殖民地色彩；在统计某些经济数据时，亦将“伪满洲国”以及其时尚为日本所窃据的朝鲜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作为日属殖民地一并列入。诸如此类不恰当或不够准确的表述，需请读者阅读时自行辨析。

原书作者表达的观点，受历史环境和认知的局限，或有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如一些西方人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日关系认识并不十分清晰，故书中偶有不恰当的语句出现。这些观点自然不确，但不可否认也是当时他国对时局的一种度测和判断。再如，原书中不乏对世界各国及其民众的评价文字，其中有些较为负面，甚至略带侮蔑。这些都是原作者个人观点的表达，不宜妄加改动，因此仍予以保留，仅对个别极不合宜的文字，进行一些技术处理。

编者水平有限，整理过程中难免有疏漏或处理失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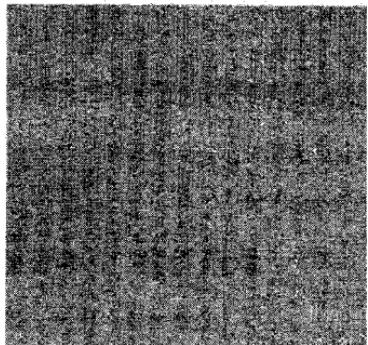
前言

出版说明

大南洋论 1

印度丛谈 247

大南洋论



李崇厚 编译

